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回顾与反思书系

◎ 石兴泽 著

当代中国文学： 悲壮辉煌的历史脚步



齊魯書社

I209.7/20

2007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回顾与反思书系

当代中国文学：悲壮辉煌的历史脚步

● 石兴泽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文学：悲壮辉煌的历史脚步/石兴泽著. —济南：齐鲁书社，2007. 11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回顾与反思书系)

ISBN 978 - 7 - 5333 - 1954 - 0

I. 当... II. 石...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②当代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7835 号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回顾与反思书系

当代中国文学：悲壮辉煌的历史脚步

石兴泽 著

出 版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信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开 本	880 × 1230 32 开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1954 - 0
定 价	20.00 元

我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代前言)

近三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先是师从薛绥之先生研究鲁迅,而后研究老舍,近几年来涉及面逐渐展开,曾经论及如郭沫若、艾青、阳翰笙、汪曾祺、贺敬之、杨朔以及傅斯年等作家,涉及“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等各种文学现象。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学报》(韩)等国内外学术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50 余篇,《新华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近 30 篇,出版《老舍与 20 世纪文学和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老舍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山东文艺出版社)、《学林风景:傅斯年和他同时代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共和国文学史论》(当代中国出版社)、《〈骆驼祥子〉解读》(合著,中华书局)等学术著作 10 多部。

从整体上看,我的研究集中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过较为重大影响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老舍等,或者影响不甚大但有个性特点的作家如艾青、汪曾祺,或者不具备上述条件但关涉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某个重要方面、某些重要现象的作家,如傅斯年、杨朔等几类作家方面。如此便形成了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把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实际考察结合起来,通过探讨具体作家创作道路的延展及成败得失达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对某种重要的文学现象进行管窥和透视的目

的。如把老舍的创作与“五四”文学、中国左翼文学、抗战文学、五六十年的文学等重要文学思潮或现象结合起来,借助于老舍创作道路的升降沉浮,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曲折发展,以及各种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对老舍创作的实际影响。在我的思考中,老舍既是具体作家、研究对象,也是检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角;而在考察老舍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互动关系的同时,也将老舍在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各个时段的进退做出合乎情理的分析。这样的研究既超越了单纯的作家作品分析,赋予具体作家以客观的史学的意义,同时也避免了空泛不着边际,对文学史的检讨落在实处,褒贬臧否都有凿凿的依据。

第二个特点在于,把作家作品研究与考察 20 世纪学术文化联系起来,赋予作家作品研究以学术文化检讨的意义。作家作品研究不是简单的论述分析,深入研究就要梳理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其中包含着对研究背后的学术文化的考察,通过作家研究史的考察,总结批评和研究的深浅得失,并借以透视批评和研究背后学术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如对于老舍研究六十五年的系统考察,撰写了《老舍研究:六十五年沧桑路》、《老舍:在文学批评的影响下前进与沉沦》以及《中国与日本、苏俄老舍研究比较论》等文章,在检讨老舍研究历史的同时,探讨六十五年间围绕老舍所开展的批评讨论对老舍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指出在社会和学术文化健康发展的情况下对于老舍的批评促进了老舍创作道路的健康发展,反之则引导老舍的创作误入歧途,如老舍五六十年代的创作选择与当时的文学批评就有直接关系,是违背创作规律的批评导致老舍创作走向沉寂。老舍批评背后是深厚的学术文化,梳理老舍研究包含着检讨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发展的意图;而且这种梳理不局限在对于现当代学术文化的简单总结,而且将中国的老舍研究与日本、苏俄的研究进行对比,进而指出,20 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受苏俄社会学影响,逐渐离开自己固有的学术传统,在接受有益

的研究方法和价值标准促进学术文化健康发展的同时,也曾经走向极端、出现很多弊病;中国的学术研究应该学习日本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方法,求真务实,把研究结论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而不是为印证某种观念或迎合某种需要离开研究对象空发议论。我将老舍研究置于深广的学术文化背景上,考察几十年间中国老舍研究的曲折道路,达到了检讨学术文化的目的。在傅斯年研究中更自觉地加强学术文化检讨的内容,通过傅斯年与北大师生的交往,考察“五四”学术文化环境,侧视被“五四”文学研究者忽视的某些内情如“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提出、《新潮》杂志的创刊、胡适等“五四”风云人物的文化理想和学术追求等,通过傅斯年与二三十年代文人学者的交往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上考察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傅斯年与同时代的人》、《傅斯年别传》其实是通过文人学者之间的交往从“民间”视角梳理和检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

第三个特点,把文本与人本结合起来,通过文本分析认识作家的审美追求、思想和情感历程,分析作家的文化心理和人格精神;通过对作家文化心理的分析寻找文本世界的主体依据,以深化对于文本世界的认识。这是一般学者的研究思路。我在此基础上深进一步,由个别作家扩及一般,致力于考察20世纪作家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人生追求和悲剧性命运;再由作家扩及整个知识界,达到对20世纪知识分子心灵世界和文化心理探讨的目的。我所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但又不止于此,我要通过具体作家的研究审视20世纪知识分子的命运,考察他们的分化瓦解即由“五四”统一的新文化革命阵营到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的情况;考察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以鲁迅、周扬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及其对促进中国社会民主进程的作用;在考察新文学由多元开放走向统一失落的过程的基础上,梳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演变的轨迹,分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瓦解和左翼知识分子自我失

落；在考察新时期文学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分析各种类型的作家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以及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知识阵营的影响和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近十几年来这种研究思路逐渐形成研究自觉和学术个性。《老舍与 20 世纪文学和文化》是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生活和创作道路及思想情感经历都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考察，通过考察达到对那时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和悲剧命运的深入认识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文化演变轨迹的透视。著作中用相当多的笔墨探讨老舍文化心理的演变——梳理演变轨迹，指出老舍从市民社会走出来，在经历了现代文化熏陶之后跳出市民社会成为一个现代型知识分子，最后却又回到市民社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人生怪圈，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共和国文学史与论》中较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文学转折的全景式考察，在此基础上分析那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构成，从外在影响和主体精神两个方面分析知识分子是怎样陷入集体无意识的。论著不仅分析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变革以及巨大的变革给中国知识分子所带来的生活和精神的深刻变化，而且深入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积淀，揭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自我失落的历史原因。有关傅斯年的研究主要是对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扫描，在混乱松散的社会文化环境里知识分子自我意识和现代民主追求还没有失去，他们致力于现代思想文化建设，为推动科学民主进程而呐喊战斗，表现出良好的人格精神，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失败者的角色，但作为一种人格精神资源值得当代知识分子汲取。他们的文学成就固然不丰，但他们人格操守是现代作家创作的精神背景，值得后来者师法。因为在 20 世纪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东西。尤其是在人文精神严重失落的当下，张扬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正是我所有研究的目的所在。

由此形成我从事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的第四个特点：忠实于

研究对象,忠实于自己的阅读理解,不盲从迷信,不人云亦云,不追赶时髦,不哗众取宠,不用自己的研究证明某些观念和理论,一切从文本出发,从史实出发。也许我的见解简单浅陋,但求真务实,治学严谨是我的追求,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贡献微薄的力量是我的目标。但我不是作纯学问,仅仅将自己的精力和智力用于阐释某种历史存在。作为当代学人,我总是立足现实发言,立足于现实选择研究对象,发掘对象所包含的与现实有益的文学和文化信息。我研究老舍创作的成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警醒当下作家避免老舍的弯路;研究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研究几十年间对老舍批评的是非功过意在昭示文学批评给批评对象所带来的影响,呼唤健康的文学批评,创建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为文学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也许我的声音微弱引不起重视,但我总想为文学和文化的健康发展、为知识分子的心理健康尽自己所能。因此在我的学术论著中,有客观冷静的分析,也有抑制不住的情感宣泄,并且因此形成我的论著的风格——于平实素朴的分析、严密的逻辑论证中掺杂个人的情感情绪,说到动情处激昂慷慨。对此,有人欣赏,也有人善意地劝我收敛个性锋芒。

我从事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近三十年时间,涉及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不算广阔,对于许多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还只是一般了解和理解,而对于鲁迅、老舍、傅斯年用力最多——尤其是老舍,我做了系统研究,已经出版了7部著作(含与人合作),我不敢说有多大成就,但对于深化老舍研究、廓清老舍研究中的某些浅见的认识、准确地认识老舍、继承他所留下的庞杂的文学和文化遗产起了推动作用。我研究傅斯年多年,出版著作3部(含与人合作),对于廓清因政治等原因造成的历史误解、全面认识这个对促进学术文化和文学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学人、继承他和像他那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遗产也起了促进作用。从研究策

略上说,我是由点及面,先凿深一口井,而后扩及其他。人生有限,学术无涯,这种选择对我比较实用。

最近几年,我的研究集中在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方面,已经发表了《缺席、在场都是尴尬的存在》(《文史哲》2006年第5期)、《青春岁月的诗性书写》(《东岳论丛》2006年第4期)、《人文地理学的浪漫主义文学简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冷峻的格调与张扬的个性——关于朦胧诗的浪漫主义解读》(澳门《中西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等文章。社会文化转型时期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属于新时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很多研究者甚至否定浪漫主义存在,但深入其中便不难发现,其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很有学术和文化价值——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社会世俗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在知识分子失去操守、躲避崇高、人文精神不振、世俗意识日趋强化的当下,研究浪漫主义文学、倡导浪漫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进步、主体精神生活提高、文学健康发展都需要浪漫主义,需要浪漫主义所坚持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崇高精神、澎湃激情、生命强力。正像诺瓦利斯所说,“这个世界必须浪漫化”,通过浪漫化,“把普遍的东西赋予更高的意义,使落俗套的东西披上神秘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使有限的东西重归无限”,“低级的自我通过浪漫化与更高更完美的自我同一起来”。学术研究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是有限的,通过学术研究张扬浪漫主义、提升社会主体的精神境界、改变世俗化的社会文化形态和走向,本身就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属于学术研究的乌托邦。也许这想法会遭受讪笑,但我不放弃研究的努力,因为总要有人冲出世俗重围,超越现实,寻求改变的途径。

(2007年5月填写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申请表格,借此回顾近三十年的治学道路,聊作小结,权作前言。)

目 录

我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代前言)	1
第一章 悲壮的挺进:作家创作机制调整与 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转换	1
第一节 创作机制调整的历史依据	1
第二节 用心良苦的调整措施	11
第三节 调整结果的理性反思	20
第二章 萧索的年代:“文革”文学简析	30
第一节 “文革”文学发生的历史必然	30
第二节 作家的悲剧命运及其抗争	33
第三节 命运迥异的几种文学样式	37
第三章 辉煌的历程: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演进	42
第一节 新旧交错中的复兴与嬗变	42
第二节 反思与歧议中的转折与探索	46
第三节 自由天地里的多元走向	50
第四节 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无序发展	57

第四章 迷乱的星空:当代中国诗歌简论	64
第一节 当代中国诗歌发展演变的致因机制浅谈	64
第二节 当代中国诗歌理念发展变化简述	67
第三节 当代中国诗歌思潮发展轨迹检视	71
第四节 当代中国诗歌美学风格刍议	75
第五节 当代中国诗歌创作的多维透视	78
第五章 流动的风景:当代中国散文扫描	87
第一节 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散文理念	87
第二节 从封闭走向开放的题材领域	90
第三节 从众尊一体到散无定式的结构体式	95
第四节 杨朔及其“诗化散文”创作的别种解读	98
第六章 浮沉的舞台:当代中国话剧艺术审视	109
第一节 五六十年代话剧思潮剪辑	109
第二节 新时期话剧思潮粗读	123
第三节 新时期话剧新潮简论	136
第七章 浪漫的小说:当代中国小说爱情书写管窥	145
第一节 五六十年代小说爱情书写的横向检讨	146
第二节 新时期小说爱情书写的纵向考察	167
第三节 新时期小说爱情书写的浪漫主义解读	190
附录一: 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宏观考察与系统研究	209
附录二: 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学	214
附录三: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寻找阳翰笙先生	219
附录四: 报告文学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	225

附录五： 深刻的启迪，诸多的困惑	229
附录六： 难以评说的新世纪文学	234
附录七： “翻阅”武训研究的两座山	237
附录八： 消费时代的文学，呼唤浪漫主义精神	243
后记	247

第一章 悲壮的挺进：作家创作机制调整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转换

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转换是通过对作家创作机制的调整实现的，围绕“调整”这一关键词，本章谈三个问题。

第一节 创作机制调整的历史依据

为促进中国文学从现代向当代转换，促使其适应人民共和国需要，治者对 20 世纪五十年代作家的创作机制乃至思想机制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其间所经历的是艰苦悲壮的过程。

就社会发展逻辑和历史规律而言，这次调整具有必然性。在人类文学发展史上，每逢社会转型、时代巨变，都会出现文学的调整与转折。古今中外，概莫例外。以中国文学发展史为例，大而言之，春秋、战国、秦汉、六朝、唐、宋、元、明、清，时代不同，文学的内涵与体式也迥然不同；细而言之，不同时代作家的创作固然不同，同一作家不同社会时期的创作也往往不同。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这话有足够的道理。

其中，有些调整变化是“自然性”的。时代沿革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风俗文化、道德观念等等都出现发展变化，作家的生活、地位、思想、感情、精神状态、审美追求等等也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此一时，彼一刻，彼此不同，其创作自然也就不同，毋须要

求和敦促,没有号召和引导,无论对具体作家还是整个时代文学,皆然。但有的调整,也带有强制性、指导性、组织性——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治者为巩固政权,维护统治,而通过某些方式对作家的思想机制和创作机制做出某些规定与要求,并动用政治和政权的力量,采取措施,敦促遵守,限制违背,从而调整作家的创作机制,扭转文学发展方向,实现文学的大转折。

上述两种调整,在人类“社会—文学”史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并且互为补充。但比较而言,前一种调整更为普遍。因为文学并不是变革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作家也不是强势群体、在社会结构中,作家大都属于社会的依附群体、弱势群体,甚至散兵游勇,构不成群体。因而作家及其文学也就得不到治者足够的重视,没有多少精力理会作家及文学的事情,除非某些文学现象或作家的创作妨碍了他们的统治。但在社会发展的某些特定时期,治者对作家及其文学都表现出相当的重视、特别的关照之余,要求他们的创作适应其统治;而作为社会良知的作家也往往感应时代的召唤,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思想和创作机制,掀起新的文学思潮,试图促使或者说通过文学带动整个社会走进新时代。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属于有组织的自觉调整。

这与文学在近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进入20世纪以降在社会生活和时代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相关,也与治者对文学对作家的重视相关。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尤其是传媒的高度发展,文学在开发民智、启发觉悟、促进社会主体思想进步,进而改变社会、推动社会发展变革中,日益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黄遵宪的“诗界革命”、“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延安文学,都曾经是思想文化革命战线上的重要方面军。革命文学在宣传、教育、鼓动等方面,在指引劳动人民走革命道路、打击侵略者、翻身求解放等革命斗争中,更是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作家也由散兵游勇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活跃而显在的社会群体,显示出强

大力量。因此,共和国成立前后,作家及其文学就成为共和国领袖特别关照的对象——其目的就是要借助这支社会力量,进行宣传和教育,统一思想,加强统治,巩固政权,促进社会进步。因而,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刚刚进驻北平才三个月,历史的车轮还没有完整地进入当代社会,就急切地筹划并召开了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共和国领袖对作家及其文学的重视,可以从他们对会议的关心程度中看出来。毛泽东、朱德、董必武等亲临会场,热烈隆重的欢迎,热情洋溢的祝辞,表达了他们对会议的殷切期望,对作家的关怀和倚重;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则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这被视为大会纲领性的文件。

关心,为调整作了铺垫(此后所表示的一系列关心,如毛泽东发动的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批示、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等等,都对调整作家创作机制产生了极其显著的效果);而调整内容,则在中华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上就已确定。也许要说,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学的调整早在1942年或更早的时间,比如说“左联”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在此我看重的是中华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因为我关注的是当代中国文学,而且在我看来,1942年的《讲话》只是局部地区的调整,后来辐射到其他地方;毛泽东的《讲话》主要是对解放区而言,文中所谈的许多现象,也是针对延安地区。至于演化成当代中国文学的方针政策,那是因为共和国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缺乏经验而使之普遍化、教条化,不能说《讲话》就规定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内容。

共和国领袖用不同的话语表达了对文艺工作者的期望和要求。在此我不想对他们讲话的内容一一转述,只就其核心内容作简要概括:用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反映工农兵群众新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塑造工农兵形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这些要求在后来的文学运动和方针政策中不断出现新的表达变数,增添新的内容,也不断具体化、系统化,强化其权威

性、指导性,但基本精神却始终如一。它对调整作家的创作机制,实现文学大转折,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调整是要调整者与调整对象共同完成的。时代要求如是,那么,当时作家创作机制是怎样的呢?

先看作家队伍构成。按照流行的说法,当时文坛上活跃着两支队伍:解放区作家和国统区作家。他们的思想感情、创作机制不同,但与共和国要求有一定距离却是共同的。概而言之,从解放区走来的作家大都接受过毛泽东文艺思想,但除少数人继续前进、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体现者和调整作家创作机制的施动者之外,大部分作家的内心深处躁动着异质的理论观念,即使极力抑制和排除,努力适应时代需要,也因时代变化过于迅速,对作家要求过于苛刻、过于具体出格等原因,而与时代要求有很大距离;至于从国统区走来的作家,在自由的理论和创作天地里走得太久,已经形成自由的思维 and 创作定势,其创作机制的许多方面都与时代要求相距甚远。

创作机制,无论对群体而言还是就个人而论,都是十分复杂的。在此,我权且将创作机制简化为写什么、怎样写、为什么写三个层面,分而析之。

先看写什么。写什么在显在层面上是题材和人物问题。就此而言,绝大多数作家曾写和习惯于写以及准备写的,大都是自己熟悉的内容。作家队伍庞大复杂,所写题材和人物也五花八门,如巴金多写在封建大家庭和社会夹缝中生活的人物及其命运,老舍擅写北京市民社会的灰色生活和精神状态,曹禺从“雷雨”写到“原野”,暴露的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现实,表现在此苦苦挣扎的灵魂;艾青、丁玲、赵树理等解放区作家多写劳动人民在民族解放和革命战争的废墟上、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困境中生存、挣扎、痛苦、反抗及其奋斗的生活经历。与巴金等作家相比,他们所写更接近时代要求,但也都是“过去”的题材和人物,缺乏“当代性”内容。

写什么在深层面上是表现什么,即创作主题。按照流行的说法,中国现代文学有三大主题:启蒙,即五四时期盛行的以暴露国民愚昧、麻木、落后、保守、涣散等精神状态,揭露封建专制及其封建礼教、启发个性意识觉醒为主要宗旨的启蒙主题;救亡,即在强敌入侵、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时期,揭露暴敌的罪恶,表现民族的痛苦灾难,张扬抗敌救国的英勇精神,鼓舞国民投奔抗敌前线英勇杀敌、救亡图存为宗旨的救亡主题;翻身,即揭露国民党及其地主资产阶级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罪行,宣传革命理论,鼓动阶级意识,教育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推翻国民党及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翻身求解放为宗旨的革命主题。主题不同,表现也千差万别,但三大主题都与痛苦、灾难、暴力、罪恶、血和泪等连在一起,而且,作家大都站在优越于人民、先觉于群众的高度说话,对人民进行有关启蒙、救亡、翻身的宣传教育。而这,是与时代要求、与时代对作家与人民关系的认定有距离的。

再看怎么写。首先是作家用什么眼光看取社会和人生。国统区作家大都用启蒙主义、民族主义、人道主义作为思想武器观照社会人生,因而他们的作品大都表现启蒙、救亡、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等主题;解放区走来的作家如赵树理、丁玲、艾青等,经受了革命理论熏陶和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高度的阶级斗争觉悟,但缺乏共和国所要求的社会主义政治内容,因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因写《我们夫妇之间》名噪一时的萧也牧,就被认为用小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描写高贵的劳动人民,而艾青虽然苦苦追求,仍被认为感情陈旧,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这样的批评自然过于苛刻,但也说明他们与时代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写什么在审美层面上是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问题。大多数作家习惯于按照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表现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虽然曾经长期提倡“大众化”,但在实际创作中,他们的艺术追求、审美情趣、艺术形式、描写方法等等,仍停留在“化大众”的层